

中文教學在道德教育中所擔當的角色

周漢光
香港中文大學

道德教育的過程其實是一個知、情、意、行的互相作用的過程，教師應使學生認識到道德對其立身處世的重要，在情感上養成明辨是非、嫉惡如仇的正義感，在意志上能秉着良知，按着社會的道德規範，堅守立場，為實現道德的行為而努力。

中文科跟其他學科一樣，也肩負了道德教育的責任。中文課本的取材，具備了知、情、意三方面的訓練。儒家及其他諸子史論，對道德教育多所發揮。善為利用對學生德育的培養有很大的裨益。即使中國文字的六書，大部分都含有中國民族的思想與文化。我國古人造字亦隱含道德人倫之深意。至於中國文學作品中所蘊含德育的作用更大，通過此等作品的研讀，作者崇高之道德意識，對學生知情意的滋養與鞏固俱有幫助。此外，在作文教學、閱讀教學與中文課本活動方面順手拈來，都可以對學生發揮道德教育的作用。

中文教學在德育方面採的是陶冶的方法，是從人性的基本功夫做起。有了這些基本功夫，則去講公民義務、知禮守法、維護社會制度與秩序等，都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The process of moral education is, in fact, an interaction among knowledge, emotion, will power and behavior. A teacher should help his or he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morality in a society of which they are members, to emotionally acquire righteousness in terms of distinguishing right from wrong and fighting the wrong as against an enemy, and to stand firm on the course of achieving good moral behavior.

Teachers of Chinese and other subject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moral education. The subject contents of a Chinese textbook should include areas of knowledge, emotion and will power. Since Confucianism and the philosophies of other Great Masters have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ir contents in moral education, if a teacher can make good use of these contents, students will benefit a great deal from him or her. The famous Six Book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lso have major parts in Chinese philosophies and culture. The characters in Chinese writing, which were invented by our forefathers, also have profound meanings in morality and familial quality. Undoubtedly, moral education is embedded in many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literature, revealing the authors' superb morality which guides students to raise and consolidate their acquired levels of knowledge, emotion and will power. In addition, it is easy to handpick relevant contents from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composition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using Chinese subject matter in order to teach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in Chinese lessons is taught by inculcation and begins with the basics of humanity. If teaching is built on these basics, it would be an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way to teach students citizenry, politeness, discipline, laws and orders.

德育的意義以及它的重要性

人生在世，只有知識技能是不足夠的。人才素質基本上是由兩個因素構成，缺一不可，它們是(一)知識才能，(二)思想品德。教育必須以發展完善的人格為最終目標，因為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能知禮義、明廉恥。可見品德教育是不容忽視的。

長久以來，不論中外，從事教育工作者都注意到品德的培養。儒家學習六經，目的在教人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朱子說：「聖人千言萬語，就是教人做人」。十九世紀德國教育家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認為「道德普遍地被認為是人類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張煥庭)。又說：「教育應以

倫理學得着目的，從心理學得着方法。」(吳俊升)。赫氏之言是有深長的意義的。因為「學問技巧，只是客觀存在的死東西，而運用此一學問技巧，乃屬於吾人一念之間利害善惡之所由判。所以教育工作，應是心物兼修、品德並重。」(蘇文擢，1978)。

從青少年身心的發展情形來看，他們正處於人生觀與世界觀的形成期，思想的可塑性很大，教師應掌握學生這個特點，努力進行品德教育培養，使他們成為有品德的人才。青少年的品德思想，是在家庭、學校與社會的教育與影響下，以及不斷的生活實踐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因此，在學校中，對青少年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品德教育，就顯得非常重要了。

品德形成的過程與道德教育的過程

品德的形成，是在人們互相的交往關係中發展起來的，這種關係，可以是思想的、可以是文化的、也可以是政治與經濟的。接觸面可以是家庭、學校、社會的人和事。它的形成，是經過模倣、啟發、同化與自我思想的建立等階段（聖雅各福羣會）。在四個階段中，受教育者都必須經過一個認知的過程，對道德產生知識上的認同，在理性上認識到道德的意義，並且感到有履行道德的需要，才能按照一定的社會道德規範去調節自己的行為，並訴諸自己的良知而行事。可見「道德的認知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學生是否接受某種道德教育，或是接受到甚麼程度，都與他們當時的思想、認知程度和心理狀態有莫大關係。學生的自覺與反省的意念愈強，則他們接受道德教育的要求愈高、要求認識也比較全面，在履行意志上也比較堅強。

事實上，學生的認知作用，是直接影響他們的道德自覺與反省能力，也影響了他的道德意志與道德情感。因為道德教育的過程，是一個知、情、意、行互相作用的過程（孫震、吳杰，1986）。知是指對道德思想的認識，也就是對是非、善惡的認識。道德上的知，正如上述，是道德情感與道德意志，以及道德行為的基礎。人如果對善惡是非未加辨認，固然不能希冀他能行善，即使他能踐善，亦不過是隨慣常的習俗而行，或偶然而行之，不能算是「有意識的行善」。所以蘇格拉底主張「知即德」說（knowledge is virtue），認為凡智慧者，必能明辨是非。而愚昧則為邪惡之根源，人能知善，方能踐善（高廣孚，1980），不無道理。

但道德貴乎實踐力行，若只知善而不踐善，是等於不知。是故我國古代儒家，不但注重道德理論，尤其着重篤履實踐。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說：「剛毅木訥近仁」，主張「身教從，言教訟。」王陽明勉人力行，認為「知之其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西方哲學家，亦有類似的言論，如柏拉圖認為善的知識，不可單從書本或他人的傳授中獲得，而須由不斷的身體力行的教育中培養而來。一個人不經過多年的實行，養成道德習慣，並須多年的努力訓練，不能懂得善的真意（朱經農，1963）。德國教育家凱欣斯泰納（G. Kerschensteiner，

1856-1932）亦認為公民教育不能以知識的教授為滿足，必須使學生在實踐上體會公民的精神，養成足以實現公民行為的品性及習慣，方為圓滿（王璧如）。但從認知到履行道德中間，又必須有情感與意志作原動力，否則道德的認知作用，亦僅停滯在理念的層面而已。

情，是指人類對客觀事物所引起的內心感受。表現出來，則為對事物的愛憎與好惡的態度，它是人們的道德認識，內部昇華為信念、外部轉化為行為的中間環節。意，是指人們為實現一定道德行為所作出的自覺的、頑強的努力，是支持道德行為的精神力量。而行，是指人們在有了一定的道德認識，加上情感與意志的交互作用下，所採取的合乎道德的行動。只有當學生養成了不斷的道德自覺與實踐之習慣，道德教育才算圓滿完成。

是故教師應使學生認識到道德對立身處世的重要，在情感上養成是是非非、嫉惡如仇的正義感；在意志上能秉着良知、檢視社會的道德規範，能堅守立場，為實現道德的行為而努力，達到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地步。

道德教育的階程論與教育責任的培養

說到道德教育，必然會牽涉到個人在羣體生活中的道德責任問題。因為人類有意志上的自由，對自己的行為，可作自由的抉擇。但人類過的是羣體生活，個人的每一行為，或多或少對他人都有影響、涉及他人的利害得失。所以個人的行為自由，要以不妨害他人為原則，個人對自己的行為，須負上道德上的責任。

道德教育的目的，除了針對上述的知、情、意、行的交互作用，養成學生的道德習慣之外，就是使學生在理智的活動下，能預先看到其行為的結果，然後進行選擇或活動，並且對這些選擇或活動負上道德責任。而上述知、情、意、行的作用，跟人類道德意識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西方的哲學家及心理學家依人類的生理及心理的發展，發現兒童道德意識的成長，是經過幾個不同的階段，教師若想道德教育奏效，必須因應學生的生理與心理發展階段的實況去施教。

康德認為人在幼稚時期須保育（Nuture），

兒童時期須管束(Discipline)，求學時期須教導(Instruction)(Kant, 1960)。史密斯(W. R. Smith)分訓導為三期：(1)軍訓式的訓育，重權威之強調；(2)個人之訓育，重人格之影響；(3)社會之訓育，重社會之制裁。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認為兒童道德意識之成長，隨生理及心理之發展，由無律、他律而至自律，有不同的分期。

- (1)無律(Anomy)：自初生至三、五歲之兒童，為自我中心時期(Egocentric Stage)，道德意識尚未發展，人際關係甚模糊，其行為表現與道德價值及行為規範無多大相關。
- (2)他律(Heteronomy)：自五歲至八、九歲，對外在之道德標準常不加懷疑，服從父母、教師的命令，屬於他律之道德判斷與道德時期。
- (3)自律(Autonomy)：九歲以後，兒童漸能運用個人的理智作道德的判斷，事事追問理由，對於長輩的規定及成人的權威，漸生懷疑，並由此培養起判斷精神，以及自動遵守行為規範的道德意識(高廣孚, 1980)。

根據皮亞傑道德分期發展來看，中學生無論在心理、生理的發展都屬於自律期，此期的青年，已經逐漸能夠作出理智的思考及判斷，並且能夠逐漸獲得明辨是非善惡的能力。從道德發展心理學(Genetic Moral Psychology)來看，道德認知能力的成長，是由無律而他律而自律，道德教育的目的，也就是培養及鞏固學生的道德意識與道德自覺的能力，使他們能預先看到行為的結果，作出正確的選擇，並對自己的行為負起道德責任。

為了達到道德責任的培養目標，在他律的道德教育，應以訓練道德行為為主，而以道德理由的闡釋為輔。在自律階段的道德教育，則在於：

- (1)啟發青年能運用其道德理論(Moral Rationality)作獨立的判斷；
- (2)養成其守法精神，並能言行一致；
- (3)能不斷對自己的行為作出反省，以培養出一顆自律的良心。

學校與教師在德育上擔當的角色

雖然學生在學校中的學習活動，並不等於社

會實踐的活動，但學生在校中的活動，係以集體組織的形式進行，集體中的正確輿論，是一種良好的教育力量，所以學校是培養學生品德的良好環境。教師通過各科教學及各種課外活動完成德育的訓練。

學校的任務在於(1)提供個人及羣體生活發展的環境，並引導學生在此環境中健康成長；(2)使學生能獲得對人對社會有貢獻的基本技能、基本知識以及生活習慣與生活態度。基本技能包括與人溝通、計算、推理、操作、及其它的學習技巧。基本知識包括自我了解、對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認識、人際關係、以及對文化、道德、精神等方面的了解與接受等。至於生活態度與生活習慣，包括了對公民義務的認識、尊重法律、秩序和社會制度、尊重他人的權利、信仰與習慣，並懂得與他人和衷合作。

在課程方面，要放迪學生對社會的興趣、明瞭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並養成學生以後在一切職務中，與人相處，能得到圓滿適當的結果。同時，從參加學校的生活中，使學生的品性得到薰陶、態度得到改善。

至於教師方面，他們是整個教育體系的基幹份子，肩負起傳道、授業、解惑的重任。學校如要達成它的使命，教師一方面必須在這個不斷演變的社會中，對學生傳播新觀念及實施優良的教育方法，以增進學生的基本知識與技能；一方面須培養學生成為明辨是非、熱心公益、肯為羣體建設的良好公民。

中文教學在德育上所擔當的角色

中文是中學課程中的一科，跟其他學科一樣，在德育上也肩負了責任。不過中文科在課材、教法與有關的活動，對學生德育的培養，自有它獨特的地方，以下就上述各點予以論述。

中文課材是知、情、意三方面的訓練

中文的學習，包括文質兩方面，文指字、詞、句、篇章，以至文字技巧方面的知識與訓練；質指性情、思想、品格的內蘊的訓練，「是理智、情感、意志的精神界所凝聚的品德。」(蘇文擢, 1978)。

中文課本的取材，具備了知、情、意三方面的訓練，是極有利於道德教育的。所謂知的訓練，表現在課程中，是一些哲理性與自然社會性

的文章；所謂情的培養，可從充滿了作家喜怒哀樂情懷的文學作品中得到薰陶；至於意志的訓練，則可從有關社會性與倫理性的作品中發揮了

作用。以下就中學課材的教學目標，略舉數例，以見中文教學，實包括知、情、意三方面的訓練：

表一

中文課材與知、情、意的訓練

課目	作者	教學目標	
		語文基礎知識與技巧	知、情、意的訓練
母親的教誨	胡適 (1891-1962年)	向學生介紹記敘文(記敘人物)的寫法。	藉作者敘述小時候母親苦心管教的種種情景所給予作者深遠的影響，以見母親撫養子女的劬勞，培養學生孝順父母的情意。
五言絕句選 (一)登鸛鵲樓	(唐)王之渙		通過詩人筆下描寫鸛鵲樓景物的壯闊，形勢的雄偉，以見祖國河山的壯麗，以及揭示出詩中所蘊含的言外之意：教人積極向上。
(二)塞下曲	(唐)盧綸	向學生介紹五言絕詩的體制及特色。	讓學生體味到詩人筆下所描述邊塞的景物，與征夫戍卒的辛苦，並了解作者厭戰的思想。
(三)憫農詩	(唐)李紳		李氏此詩，一方面關懷農夫工作的辛苦，一方面慨歎那些坐享其成的人不知愛惜糧食。讀此詩時，教學生珍惜物力，勤儉持家。
父親的信	林良 (1924年-)	教導學生學習及加強對寫信方式與技巧的研習。	通過作者給女兒櫻櫻的信，讓學生學習怎樣去跟同學相處，認識對方，重視友誼等實際重要問題。
陳元方答客問	劉義慶 (南朝宋人, 403-444年)	1. 使學生學習淺近的文言文。 2. 令學生了解漢魏間重視人物品鑒，流行清議的風尚。	透過陳元方年僅七歲，即能以禮與信折服父親的朋友，以見他的資質穎異不同常兒的事實。藉此教導兒童必須講信用，對人要有禮貌。
行道樹	張曉風 (1941年-)	使學生認識及學習擬人法的自述寫法。	借文中所述「行道樹」所抒發的憂與樂，希望學生能體認到環境污染的嚴重性。在消極方面，希望學生做到不污染環境，保持環境清潔；積極方面，盼望學生能像「行道樹」般，盡量的掃除污染，使我們都享有一個清新的環境。

課目	作者	教學目標	
		語文基礎知識與技巧	知、情、意的訓練
從今天起	甘績瑞 (現代人, 生平不詳)	使學生認識論說文的寫法。	勉勵學生不論為善或去惡，都要及時努力，千萬不可因循怠惰，才能革除惡習，開創事業。
飲水思源	藍陰鼎 (1903-1979年)	指導學生學習用記敘文方式來說理的方法。	借擣米老人尋求供應自己生活所需來源的故事，說明我們人的一生，是上天與整個社會的賜予。教學生要懂得飲水思源，除了要滿懷感激的心之外，更應努力奮鬥，以回報天地及社會對我們的供養，去成就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論語論學選 (兩則)	論語	使學生了解孔子學說大概及論語之性質及由來。	1. 使學生明瞭學習與思考必須並重，不能偏廢； 2. 使學生了解為學成敗在己，貴在持之以恆。
匆匆	朱自清	使學生認識及欣賞散文詩的特點。	使學生從本文作者，對時間流逝的具體感受，了解到應該努力把握現在。
左忠毅公軼事	(清)方苞	使學生學習文言文的寫作方法。	使學生認識史可法冒死探獄及左光斗之烈行苦心，以見左公之忠義行誼，與史公重師恩的美德。培養學生正義感與尊師重道的精神。
廉恥	(清)顧炎武	使學生學習文言文的論說方法。	使學生明瞭「廉恥」與個人、國家的關係。
訓儉示康	(宋)司馬光	使學生學習文言文的論說方法。	通過作者闡論儉德為修德之基，以訓其子身當服行，並傳以後嗣之意，教導學生注重儉德。
學問之趣味	梁啟超	使學生認識新文體及演講辭的作法。	作者主張凡人須生活於趣味中，生活始有價值。研究學問，最能使生活產生高度的趣味。鼓勵學生從求學問中去找尋生活的趣味。

以上所列舉數例，隨手拈來，可見凡屬典範性的作品，必融合知、情、意三者的內蘊，正是我們中文科選取課材的目標。所以蘇文擢先生

(1978)認為中文的學習乃是中國人整體的訓練，中文課材中「形、音、義的文字知識，訴之於知；文學作品，訴之於情。知情的結合，自然提

昇到意志，而成爲德性的培養。其間涵三爲一，不容分割。」(蘇文擢, 1983)，是一點沒有錯的。

中國傳統文化與儒家道德思想的德育作用。我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在現存的經史子集中，正蘊藏大量教育上乘的作品，經得起時空的考驗。其中：

羣經諸子——傾向於說理，足以化人、導人向善。

諸史傳記——雖屬記事寫人，必定以情理動人而富真實感，導人去惡而從善。

集部之作——作者用以導洩其情、讀者亦因情與感，遷善遠惡而不自知。

儒家思想是我國文化之主流，它是人文主義的思想，最能適合我國民族感情。儒家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敦厚、崇禮的文化精神，把一切自然現象結合到人類德性去描述(蘇文擢, 1983)。錢穆先生看到文化傳統之深厚，充滿積極的作用，他認爲中國文化環境闊而疏，故一切宗教、文學、政治、禮律，凡所以維繫民族文化而推進之者，皆求能向心而上行(錢穆)。儒家理論，固然有很多積極向上的思想，可用作德育教材，其他諸子史論，對德育方面，亦多有裨益，蘇文擢先生在《邊加室講論集》中亦指出不少，如：墨子的勞動節儉的學說，對消費狂熱和生產遲滯的社會，特別有意義；韓非子的明賞罰、任法刑，對市民奉公守法、肅貪倡廉有極大的啟發；莊子的齊物論，則有助於青年人的獨立思考(錢穆)等等。自古以來，中國的文化主要在看重當前社會之實際應用，是故上述有關德育的教材，在中國傳統的經籍中，可謂取之不竭、用之不盡。如果善爲利用，對學生德育的培養，有很大的積極作用。正如蘇文擢先生所言：

「以當前本港而論，具體的如肅貪倡廉、防止暴力、安老慈幼、濟貧保良、防止罪行、救助殘廢；較抽象的如勤勞、正直、誠實、禮讓、仁慈等等，凡有助社會安定的，沒有一樣不和人性優良面有關，也就和中國傳統道德有關。」(錢穆)。

通過中國語文教育去實行道德教育，有一個方便的地方，就是母語的使用，加上內容是學生比較熟悉的自己文化，對學生有親切感，接受起

來會事半功倍，而且是順理成章的。

中國文字所蘊含的道德意識。中國文字的構造，以象形始，繼之以象事(即指事)，又以單字組合成象意(即會意)，再以形聲相錯綜而產生象聲(即形聲)，合四者而中國文字的體制大體具備。因爲中華民族的文化由來已久，而且幅員又廣，方言俗語雖時時而生，但以雅俗之交相作用，中國文字常能消融方言，條貫如一，發揮調洽融和之作用，有利於我國各民族之團結。我國文字用字少而包含之意義則甚豐富。構成中國文字的六書，大部分就含有中國民族的思想與文化。更緣於我國古人造字，已隱含道德人倫之深意於其中，因此我國文字本身已含有德性教育。例如：

仁——人從二爲仁，有「相人偶」之義。

義——從羊，實爲善的省文；從我，表示「義以治我」(董仲舒說)。

孝——從老省，下從子，子承老也。

弟——即次第，從韋省聲，由韋束之次第，轉化爲長幼順序，所以古人弟第相通。

培——從土得義，從音得音，其訓詁爲以泥土培養萬物。故《中庸》說：「栽者培之」，意思是既然栽了苗，就得用土壤來供應它的營養。正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意思。

正——從一止，古人從一是。古人射箭的箭靶，叫做「正鵠」，其意義等於說一個正確的目標，教育當然要有理想，教人以文中至正。

中——從口，音圍，丨貫其中，溝通上下，有「內也」和「外也」兩重意思。「內」表示其內在的向心力，「外」表示對外的周延性。我們國家民族一早就叫做「中華」、「中國」，已經揭示了這一民族性對內對外的基本精神。

學——有效也和覺也兩種訓詁，模仿與創造並重。效的意義從𠄎轉變而來，𠄎的部分就是仿效，子的部分是代表了年輕受教，支的部分帶扑擊懲罰之意。《書經》說「扑作教刑」，《學記》說「夏楚二物，收其成也。」後來省去了支，加上白的發音，一方面吸收了覺的上半部而成學字，才完成了模仿與創造的雙重意思(蘇文擢, 1983)。

金——於五行爲至剛，曾國藩所謂「天之生人以剛直葆其本真。」其說本之孟子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佛言金剛不壞之身。金色本黃，坤卦「六五，黃裳元吉，文在其中」，又爲富貴之象。一個金字，其本質通於乾卦陽剛之德性，其外象通於坤卦黃中之美文。德教意義，已極深厚。

文——錯畫的意思。文彩交錯，演化爲文字、文章、文學；在人性上溫文爾雅，文質彬彬，都是高尚的情操。

泰——爲大水，義本流通。所以在天則陰陽交泰，在國則國泰民安，在人則身心舒泰，全屬美德的形容（蘇文擢，1983）。

其他在中國文字，含有道德教化意義者，所在多是，如：

人——《說文》：「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人爲最高靈性與智慧的動物。高亨說：「按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地之仁也；人同具此仁心，故云天地之性最貴也。」（高亨）。了解人與禽獸之別，則人當懂得如何自處。

父——父，矩也，從彗舉杖，解作家長率教的意思。又象徵手持斧形，許慎解作「矩」，是說父親有規矩以教子女的意思（高亨）。

鳥——烏鴉。鳥，孝鳥也。象形字，烏鴉反哺，所以許慎說：「孝鳥」。中國解字，亦多着眼於與道德有關的事實，認識中國文字，亦隨之可認識中國之道德思想。

兄——長也，從儿，從口。兄從人，從口，取其教弟妹之意（高亨）。

中國文字，像上述所舉例子，含有德化意義的很多。可見蘇文擢先生所說的「中國文字並不是一堆符號，他有靈魂有生命，有他內蘊的意象」（蘇文擢）。是相當精闢的說法。明乎此，則教師於文字的講解介紹時，因應課文的需要、以及學生程度的高低，酌量教以文字的德育含義，使學生一方面了解其形、音、義，同時亦明瞭古人造字的深意，則對於學生之知、情、意三方面俱有所裨益。

中國文學作品所蘊含的德育作用。大凡優秀的文學作品，多能反映時代，具有人類理性中高尚而深遠的倫常道德。所以傅庚生說：「文學創作者，執其高尚之人格，挾其濃厚之感情，出之至誠，發爲文字，其感人之力自深，遂成爲千古不朽之傑作。」（傅庚生）。錢穆先生更進一步指出中國文學作家雖以作家個人爲主，而此個人，是上承無窮，下啟無窮，具有一種極度自信。此種自信，是來自作家的聖賢意境。此意境實爲中國標準學者之一種共同信仰與共同精神所在。表現在文學中，則必性情與道德合一，文學與人格合一（錢穆）。

錢穆先生並引陳子昂之《感遇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說「此詩從一方面看，則只見一愴然獨泣之個人；然從另一方面看，在此個人之意境中，固是上接古人，下待來者，有一大傳統存在之極度自信。彼之愴然獨泣，實爲天地悠悠之一脈所存寄。」（錢穆）。大抵中國文學重在即事生感，即景生情。尤其重要的，在於從作者個人的情感中，可以反映出時代的脈搏與當時人生的全貌。陳子昂生當武后當政之日，憂世深衷，難於暢宣，遂有此傳誦千古之佳作。

優良的文學作品，必定流露作者的情性品格與行身大節。徐復觀先生所說的「文學的最高動機和最大感染力，必然來自作者內心崇高的道德意識。」（徐復觀）。最能道出個中要妙所在。證諸我國歷來爲人所傳誦的文學作品，如屈原之辭賦，杜甫、蘇軾、陸游之詩，韓柳的散文、李後主、辛棄疾的詞，關漢卿的戲劇等等，莫不充滿作者的品格情性與行身大節、家國感懷。我們研讀中國文學作品，除了可以體會與學習許多表情、敘事、寫景、說理的技巧之外，並且可通過蘊含於其中豐富的中國文化特質與作者之崇高的道德意義，在知、情、意三方面都得到滋養與鞏固。劉勰說：「綴文者情動而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劉勰）。在我們細心研讀、吟咏與欣賞中國文學作品之時，其中有關道德修養的資料，已在一種潛移默化的形式中，深深的印入我們的腦際，發揮了積極的道德教育作用了。

因此在教學時，若能把握中國文學上述的特質，發揮中文教育的思想品德、語文技巧與文學欣賞的三種作用，則對學生將是受用無窮的。

作文教學、閱讀教學與中文課外活動所發揮的德育作用

範文教學與作文教學是息息相關的。在範文教學時，引導學生深入領會範文中的思想內容，從而得到人格情性的感化，同時也為作文教學提供了有用的資料。通過對成功作品的摹擬，口誦心維與細心揣摩，則作者之文章風格、語法、筆調也會為學生帶來了寫作方面的啟示。在作文教學中，教師一方面指導學生正確地運用字、詞和句子，留意篇章結構與修辭技巧等，務期能鞏固語文基礎知識，獲得語文基礎技能；同時，通過指導學生觀察生活、提鍊素材去表達健康的思想感情的過程中，亦可提高學生的道德意識。

至於課外閱讀教學，從教學生如何選擇優良的書報雜誌，已具有德育作用。再經過閱讀指導與討論，以至學生閱讀時披文以入情、細心體味書中的情理思想，更是道德教育的潛移默化。此外要求學生去寫讀後感、作書評，更是對培養學生的道德自覺能力與道德判斷能力，有極大的幫助。

談到中文課外活動，更是寓道德教育於活動與興趣之中，也是進行品德教育很好的時刻。可資進行品德教育的中文課外活動不少，最常利用到的有下列數種：中國文學營、國學常識班、詩詞欣賞會、書法班、中文學會所舉辦的社際活動如朗誦比賽、書法比賽、問答比賽、作文比賽等等。教師可透過這些活動，對學生進行羣育與品德訓練。通過鼓勵學生主動參予組織工作，並利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方法，訓練學生獨立思考，辨別是非善惡，探討人生問題，從而培養道德情操，養成道德行為習慣。

中文教學在「道德教育的過程」與「道德責任的培養」所起的作用

中文教育的目的，除了要照顧到訓練學生聽、講、讀、寫的工具性的語文知識與技能外，通過課材及有關的活動，培養學生有良好的人生觀與人生態度，具崇高的理想與正確的生活習慣，這是屬於思想性方面的事。

我國文化是以倫理道德為主流，因此在選取課材時必然會涉及中國的倫理道德與文化精神等方面。在分析課材中的情與理，固然會涉及德育問題，有時即使分析一字一句的意義，遣詞用典的深意，以至文章的作法、表達的形式等等，無

一不與德育有密切的關係。中文教師相信也有一種經驗：就是我們有時想少講一些與品德修養有關的東西，也有欲罷不能的感覺。因為中文課材所蘊含的道德意識是那麼濃厚，要把它截然分離不講，是萬萬不可能的。因為這樣做，我們根本沒有完成我們應完成的教學目標。何況，這正是中文教學的長處哩！作為中文老師，是應該好好珍惜的！

剛才提到道德教育的過程是從無律而他律而自律，須着眼於自律階段的學生道德責任的培養。中文學習在德育方面採的是陶冶的方法，不是硬梆梆的，而是潛移默化的，更不是獨斷的與專橫的灌輸。它是通過教材的啟示，有作者高尚的人格與崇高的理想為典範。通過文中情理的欣賞與口誦心維的浸淫作用，培養了學生自我教育的能力。通過「內省」的方式，喚起學生的良知。可以說，中文教育的德育作用是從人性的基本功夫做起，有了這些基本功夫，則去講公民義務、知禮守法、維護社會制度與秩序、尊重他人權利與信仰，以及懂得與他人和衷合作等，都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何善用中文教學去發揮道德教育教材方面

我國的經史子集雖然充滿了道德教育的素材，但為了配合中文教學的目的，必須選取一些在文字技巧的知、文學欣賞的情、道德教育的意，三者都有可取，才可以作為教導學生的課材。這些課材，可向中國傳統文化作品中去尋，也可以從近人有積極性、富含教育意義的優秀作品中去選取。因此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以至近人的詩詞政論等，只要符合上述標準，具有崇高的理念、高潔的情操，都可以作為學生的教材。此外，蘇文擢先生所提出的精選經書和淺化經書（蘇文擢，1983），也是一個好方法。

教法方面

老師如能對教材有深入的了解與愛好，則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學生自然能夠得到老師的感染與啟發。這時候，老師可活用中文教材與有關活動中每一教學範疇，把做人的基本道理，作有意識地、有系統地介紹給學生，以培養學生高尚的品德、養成潔身自愛、了解世界及建立人生目標。

教學時先從字、詞、章、句等作一番闡釋，進而使學生感受作者真摯的感情，再進一步吸收其理性上的教化作用。教師需盡量發掘傳統文化中的優良面，提供現代生活上的調節，從安身立命到處事待人，都能建立一個正確的價值觀，並從而產生人生上的依存感(蘇文擢, 1983)。納語文分析、文學欣賞與道德教育三者於一爐而共治。

至於教學方法方面，教師講授之外，分組討論是一個良好的方法，其他如故事演講、角色扮演、設計教學、專題研究等，都可以靈活運用。

參考文獻

張伯行(1968)輯訂, 力行篇。朱子語類輯略, 卷三(頁75)。
台北：商務印書館。

王璧如。現代教育概論, 第九章。台北：正中書局。
朱經農(1963)。教育思想(頁57)。台北：商務印書館。
吳俊升。從倫理學的觀點論教育上之興趣與努力問題。見農圃講錄(頁111)。香港。
徐復觀。文心雕龍文體論。
香港聖雅各福羣會。德育研討綜合報告(頁29)。
高亨。文字形義學概論(頁86)。香港：邵華文化服務社。
高廣孚(1980)。論道德教育理論與實踐。見林子勛(主編), 中華學術與現代文化, 叢書十一, 教育學論集(頁206)。台北：華岡出版社。
張煥庭(主編)。西方資產階級教育著選(頁259-260)。
傅庚生。中國文學學隅(頁19)。香港：南國出版社。
孫震, 吳杰(主編)(1986)。教育學(第一版)(頁233)。
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
劉勰。(1960)。文心雕龍。香港：商務印書館。
錢穆。中國文學講演集(頁17)。香港：人生出版社。
蘇文擢(1978)。淺語集(頁91-277)。香港：華南印刷製版公司。
蘇文擢(1983)。遼加室講論集。香港。

作者

周漢光, 香港沙田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系講師。